

从“普九”谈教育危机及其他

The Educational Crisis Seen from "To Make a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Universal"

肖绍清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3)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为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一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二者并称为教育建设的“两基”,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对这利国利民的盛事,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很自然,建国以来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运动使本不丰富的教育资源几近消失殆尽,从“十年浩劫”中疲惫走出的广大人民,深感教育受伤之重和教育危机之深,他们真心期望我们的人民教育健康成长。而现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努力,力治教育创伤,振兴人民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好教育应做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普九(包括扫盲),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人们的激情澎湃,也足可想见。可以说,普九(包括扫盲)的出现,正是对建国以来第一次巨大教育危机的回应。

10多年来,普九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世人自有目共睹。且说人所能见的:从幼儿园到中学,从城市到农村,一幢幢漂亮的现代化教学楼拔地而起,一间间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理化生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微机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生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认真上课,课后小鸟般地在操场上自由活泼地活动……这种种情景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再说似乎看不见的:以往想读书的孩子,不管他有多勤奋,因客观条件所限(如各种运动的影响、基本办学条件的低劣),也可能读不成什么书;而现在,只要真想读点书,真想学点知识,各方面条件还是有的。确实,人们没有理由抹煞普九的成就与功劳。

但是,客观地说,人们对普九的评价有时是脱离实际了,对普九的深层认识有时是太缺乏了。中国的普九固然成绩显著,但就没有问题了么?当然不是。但我们的领导者心知肚明吗?我看既是又不是,而且我深信大部分群众也是这么认为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心知肚明——有什么比儿童失学、中途辍学严重、童工大量出现、学校危房事故频发等更为人们关切的呢?从另一种角度上说,他们

看来又不明就里——从儿童大量失学、文盲半文盲仍大量存在甚至有隐性增加趋势等折射出的教育危机,他们心中清楚、明白吗?人们不知道,至少领导者没有明说过。

平心而论,从普九与教育危机的微妙关系中能察觉某些信息的人并能采取对策行动的人,也不能一而概之地说没有。一个若明若暗的例证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省、自治区无一不加快了普九的步伐。而且,据说中央有一个目标,即要到本世纪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不过,太过急切的心情和太过顽固的高指标以及唯数量的思维定势并不总是好事。既然“上”有政策,“下”就不得不有对策。到本世纪末不是只剩1年了吗?看来不采取“切实”措施是不行了。首先感到“不行了”的是许多领导者,也许他们也是感受最深,甚至是唯一感受“压力”的人群,个中原因,人人明晓。如何采取措施呢?对于这一问题,太过认真的人没有必要那么认真的,国人自有办法!何出此言?50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前车可鉴!说白了,主要对策之一就是做假、造假。

笔者就读研究生以前曾是某省革命老区一所农村初级中学的一名教师。1998年初,该校被抽中,作为乡的代表学校和县的代表学校之一,参加由省里组织的普九检查验收。于是,繁重而慎密的造假行动开始了。举一例则明之:按普九规定和学龄儿童情况,该校初一应有700名学生左右,而当时仅实有300多人(6个教学班),另有300多人怎么交代?当然不能报告说流失了300多名学生。但上级已给你算到700人了,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顺势造假应付了。方法总是有的:(1)从外乡“借”学生,甚至从临县“借”学生补数;(2)生造出一批学生姓名补数,此乃主要方法;(3)从小学高年级学生、初中毕业生和社会成人中“借姓名”补数。乃至出现了一个学生在这儿姓名是A,在那儿又名氏为B,甚至被告诫,若有询问时,何种情况该说A,何种情况该说B,结果弄得学生稀里糊涂,有时竟出现连自己真姓实名也搞乱搞“忘”了的可笑可悲可叹事件。至于这种“普

九造假实践”教育给孩子们心灵上造成的终身性残害,那更是不堪前瞻、不堪深思的!而此等事例,却不胜枚举。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学校不仅获得了该县10多所被检学校的第一名,居然还获得了全省第一名。对此结果,笔者确似不应感到震惊:以该校所做的“工作”,拿个“第一名”自然不足为奇;然而笔者又实感震惊:难道上面真不知内情?抑或明知而装不知?据笔者所知,此种虚假的“普九”绝非仅笔者所在学校有,全国各地各级主管部门,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统计、报表、报告中的虚实又如何?真不知普九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重!笔者真是“迷惑不已”。想想那几个月中各位教师同仁(包括笔者本人)的“艰辛”造假劳动,真是既怀内疚又感无奈。如果所谓普九就是这种样子,不用劳民伤财、贻害无穷来形容,是实难表达的。

当然,不是说这种普九只有弊而无利(我们中国人一贯讲究辩证地看问题,哪怕只有一丝益处也可称“利”),而是说,这种普九实在弊远大于利。这种普九,从一开始就孕育着、生产着教育危机,或者其本身即无异于教育危机。笔者甚至把包括这种普九在内的诸多教育活动所形成的教育事实,统称为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教育危机(尽管它的恶果可能要若干年后才会充分显现)。也许这次教育危机不像20多年前的那次更为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深刻、缓慢、隐蔽性大,故而更容易被人们忽视。国人不会忘记,50年前,人们曾用行动证明,新中国可以建设自己的新教育,来彻底消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教育危机;而20多年前,人们却又一次饱受灾害深

重的教育危机之苦,随后又一次用行动作出了对教育危机的回应。而不久的将来,我们是否又将面临类似的情形?30年、50年,或者100年后,当人们回首往事时,当我们的子孙“享受”他们的父辈创建的教育“成果”时,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今天这样,对于1966年爆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及其造成的教育危机,既感震惊无比,记忆犹新,又饱受创伤,惋惜、无奈不已呢?!

在上述普九验收工作中,广大普通教师,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根源所在的,可是他们的观察和观感在整个事件中不起任何作用,甚至作为旁观者提醒的作用也起不到。他们当然不愿违心地做这种“工作”,偏偏又正是这种“工作”的最直接参与者,因为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他们去完成。他们悲哀吗?当然!但真正可悲的是,国人尤其是许多领导者似乎对这种普九的问题严重性及其折射出的教育危机还未切实意识到,或者根本未意识到,甚至根本就不愿意去意识。当一小部分人在为问题的严重性担忧的时候,更多的人则在乐此不疲、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并藉以争功邀赏。在有些人眼里,像普九这样的工作不过是一种“游戏”:数字游戏、权力游戏、政治游戏……,而正是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游戏”,加重了正直的人们的担忧(联想到诸如扫盲等教育工作中的类似境遇,人们有这种“深感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也注定了教育危机雪上加霜的命运。但愿,这种“游戏”以及教育以外领域的类似“游戏”能早日结束。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12页)

入到具体机制时必然要借助于现代生命科学成果。因为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或物质世界的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系统知识。

从以上分析是否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的认识,即我国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存在着亘古及今的延续关系。例如,40年前提出的一个具有卓识的“经络—皮层—内脏相关”假说(1959)已为经络通路现象作出准确的科学定位^[5]。当然,必须指出2000年来随着科学进步、知识的更新,原有认识差距会造成很多误判和误解,这些均需要纠正或摒弃。但是,由于经络科学的客观性已被论证,是否也可以提问:

(1) 中国古典经络科学采取对人脑表象以模拟图像和模型方式所作出的客观表达,既已用于传统医学诊断与治疗实践上千年了,它能否与现代科学对针刺引起人脑表象已作出的表达进行比较?

(2) 从同一性观点出发的、作为经络科学研究对象的并置膜结构不正是细胞个体及群体的膜内、外

微环境吗?不正是可能调制分子、原子活动的微空间吗?

(3) 就中国的传统文明而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传统医学的基本原则,在这种自然观越来越表现出其深远的科学含义时,难道不可以把古代经络科学和现代环境生物学结合考虑,进而发掘和发扬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经络科学理论体系吗?

参考文献

- [1] 张人骧. 经络——重要的生命科学命题. 科技导报, 1995(6)
- [2] 马继兴. 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 文物, 1996(4)
- [3] 张人骧. 经络科学的里程碑. 科学通报, 1998(1)
- [4] 熊卫红等. 水蛭AP神经元突触部位分辨的电导调控机制.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4)
- [5] 张锡钧等. 经络—皮层—内脏相关假说的进一步探索. 美国中医学杂志, 1983(2)

(责任编辑 蔡德诚)